

劳动经济评论

LABOR ECONOMIC REVIEW

第4卷 第1辑 2011年5月

Volume 4 Number 1 May 2011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劳动经济评论

《劳动经济评论》(C刊) 2017年第1期

《劳动经济评论》(C刊) 2017年第1期

劳动经济评论

LABOR ECONOMIC REVIEW

第4卷 第1辑 2011年5月
Volume 4 Number 1 May 2011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劳动经济评论. 第4卷. 第1辑/—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141-0710-4

I. ①劳… II. ①罗…②刘… III. ①劳动经济—中国—文集 IV. ①F2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6961 号

责任编辑: 柳 敏 段小青

责任校对: 杨晓莹

版式设计: 齐 杰

技术编辑: 邱 天

劳动经济评论

第4卷 第1辑 2011年5月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编: 100142

总编辑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汉德鼎印刷厂印刷

德利装订厂装订

787×1092 16开 12.5印张 260000字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41-0710-4 定价: 25.0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收入分配

- 关于中国劳动报酬占 GDP 份额变动的研究 张车伟 张士斌 (1)
- 我国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状况分析 段成荣 马学阳 (34)
- 最低工资制度对农民工群体就业的影响研究 课题组 (54)
- 人口流动、结构变迁与劳动报酬比例变动
——兼论 U 型转变的实现条件 陆万军 (72)

人力资本

- 我国人力资源科技张力现状及其追赶 鹿 立 (84)
- 企业知识创造及其类型探讨 戈黎华 孙汉清 (100)
- 用工结构短缺、经济转型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
——基于浙江的调查 宋树理 钦北愚 (111)
- 我国延长退休年龄的探究：基于人力资本的研究视角 袁廿一 (122)

劳动关系

- 西方国家工人合作制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吴宇晖 佟训舟 (152)
- 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的变迁、特点与对人力资源管理的
挑战 张丽华 程卫凯 (168)
-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基于收入分配的视角 李 娟 (178)
- 《劳动经济评论》投稿体例 (191)

CONTENTS

Income Distribution

- A Study on Labor Share in GDP in China Zhang Juwei Zhang Shibin (33)
- A Study on Generation Differences of Peasant Workers in Current
China Duan Chengrong Ma Xueyang (52)
- 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 System on the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Research Group (71)
- Labor Migr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Labor Share:
The Conditions of U-transformation Achievement Lu Wanjun (82)

Human Capital

- Status and Pursuit of Human Resources Technology Tension Lu Li (99)
- Discussion on the Enterprise Knowledge Creation and
Its Types Ge Lihua Sun Hanqing (110)
- Structural Shortage of Employmen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Zhejiang's Private
Enterprises Song Shuli Qin Beiyu (121)
- Research on China's Lengthening the Retirement Age Based on Human
Capital Perspective Yuan Nianyi (150)

Labor Relations

-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orkers Cooperation Economy in
Western Countries Wu Yuhui Tong Xunzhou (167)
- The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 of Labor Relation in Chinese Mainland
After 1949 and Challenge to HR Practice Zhang Lihua Cheng Weikai (177)
-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in China in the Post-financial
Crisis Era—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Li Juan (190)
- Contribution Style of *Labor Economic Review* (191)

关于中国劳动报酬占 GDP 份额变动的研究

张车伟 张士斌*

摘 要：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占 GDP 比重下降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事实，但如何衡量劳动报酬收入却没有公认标准，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因而受如何度量劳动报酬度的影响。通过按国际上可比口径对中国劳动报酬加以调整，本文发现中国劳动报酬占 GDP 份额的下降趋势并不严重，而是表现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特征。中国初次分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而是这一份额长期处于低水平，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似乎陷入了一种低水平稳定状态。

关键词：劳动报酬 初次分配 工业化

一、引言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就对生产要素的分配产生了浓厚兴趣，李嘉图更是将探索收入分配规律视为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古典经济学中，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厂商将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过程，获得产出（商品和服务）；同时，各要素获得相应的回报：资本获得利息、劳动获得工资、土地获得地租，这就是国民收入的功能性分配（function distribution，亦称为初次分配），劳动份额即工资和薪水等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国民收入账户尚未建立的时代，经济学家从微观（家庭和企业）层面探讨了各要素的分配比例，并将劳动份额作为衡量收入分配状况的粗略指标。20 世纪，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账户逐渐完善起来，它揭示了一个

* 张车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E-Mail: zhangjw@cass.org.cn。张士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博士后，贵州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令人惊讶的事实：劳动份额具有长期的相对稳定性。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英国在 1880 年最终实现了工业国蓝图，美国、德国、法国及日本等国也完成了工业化。在这 100 年中，生产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步，工业化国家的人均资本、人均产出、经济结构、人口分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① 国民收入中各要素的分配似乎也应该出现较大变动。但实际上，英、美等国国民收入中的劳动份额相当稳定，并没有随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周期的更替而大幅波动。凯恩斯^②（Keynes, John M., 1939）、卡尔多（Kaldor N., 1961）等先后观察到了这个现象，卡尔多直接将劳动份额的长期稳定性视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征事实。

我国各界一直对劳动份额问题颇为关注，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明确提出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要求。特别是在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过程中，基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和扩大内需的需要，劳动份额的波动规律成为热点问题。就学术研究而言，国内研究普遍认为 1990 年以来，中国的劳动份额明显下降，但不同学者对其下降幅度的观点并不一致。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判断^③反映了中国劳动份额波动的事实吗？从国际视角，中国劳动份额的波动具有怎样的特征？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些事实与特征？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综述了国内外对劳动份额变动问题的研究，第二部分提供了研究数据的来源与测度方法，第三部分通过中外比较，探讨了 1978 ~ 2007 年间中国劳动份额的波动情况，第四部分是结论与含义。

二、研究综述

我国初次分配的关注点往往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而转变，从早期消费与积累关系的剖析，到公平与效率排序的激辩，再到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制的建立，学者们无不紧扣时代脉搏，突出展现了经济学研究与时俱进的特征。

有关我国劳动收入分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份额的变动情况

① 以人均产出为例，1870 ~ 1950 年，西欧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增长了 1.5 倍，美国增长了 2.9 倍，加拿大增长了 3.4 倍，参见麦迪逊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9 页。

② 凯恩斯发现，1920 ~ 1935 年间，英国和美国的劳动份额都以平均线为中心随机波动，且两国的差距也比较稳定，他认为英、美两国劳动份额的差异可以用垄断程度及基础条件的差异来解释。参见：Keynes, John M. "Relative Movements of Real Wages and Output." *Economic Journal*, 1939, March: 34 - 51。

③ 有关劳动份额变动的基本论断是一系列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不同的结论将导致不同的政策组合。如李稻葵就认为中国劳动份额的变动规律符合“U”字形规律，且处于劳动收入下降期，因而该结论带有一定的悲观色彩，虽然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服务业发展、完善劳动经济制度、建立有效可持续的现代市场经济劳动制度可能对中国劳动份额产生一些正面影响，但是无法改变中国近期劳动收入下降的基本规律。

及其规律,二是引起中国劳动份额变动的原因,即影响劳动份额的因素分析。国内研究者普遍接受中国劳动份额明显下降的观点,但不同学者对其具体下降情况有不同意见。白恩重(2008)用全国劳动者报酬除以净 GDP(总 GDP 扣除净间接税)来表示劳动份额,经过计算,他认为中国 1995 年劳动份额为 59.7%,2006 年为 47.3%,下降了 10 多个百分点;李稻葵(2009)则用劳动者报酬除以总 GDP 来表示劳动份额,发现中国劳动份额从 1990 年的 53% 下降到 2006 年的 40% 左右。就影响劳动份额的因素而言,早期研究集中于工资有无侵蚀利润的争论上。戴园晨和黎汉明(1988)认为国有企业的劳动定价(工资制度)方式导致了生产成本中工资比例的上升,利润比例的下降,从而工资侵蚀了利润。这种观点一度在中国非常流行,也被视为国有企业工资制度改革的重要原因,但另一些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如唐宗焜(1995)认为资本所得的减少并不是由于工资份额的上升,而是由于利息份额的上升,国有企业的资本利息最终又被国有银行的控制者——国家所得。白恩重等人(2008)认为,1995~2004 年间中国劳动份额的下降中有 50% 是统计口径的调整造成的,约 30% 是产业结构转型造成的,剩下的是国有企业改制和垄断程度变化造成的,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变化是劳动力话语权减少的结果。近期的相关研究集中于产业结构、资本和劳动的谈判力量、经济制度改革等方面,其共同点是认为劳动份额变动与经济发展过程和产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李稻葵等利用简单调整后的联合国雇员报酬数据,^①发现从国际范围内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U”字形关系,^②而中国正处在“U”形曲线的左边,意味着中国的劳动份额仍将继续降低;接着,他们通过对中国工业企业相关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和劳动谈判力量的变化也是导致劳动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劳动份额经历了先升和后降的过程;同时,英语系国家的变动幅度相对较小,欧洲大陆国家的变动幅度相对较大。针对这种新情况,国外学者从石油冲击、高涨的失业率、资本国际化、贸易国际化以及全球化的角度展开了影响劳动份额变动的实证分析。由于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劳动份额的波动

① 西方学者在研究 OECD 国家劳动份额的变动时,主要采用了 OECD 的统计数据及各国的国民收入账户数据,只有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份额问题时,才使用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主要是因为联合国数据中的劳动收入仅包括公司雇员的劳动报酬,而不包括自雇者的劳动报酬。据李稻葵所言,其采用的调整方法是在联合国数据的基础上将自雇者的所有收入(包括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土地收入)都加入到劳动报酬中。参见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 中劳动份额演变的 U 型规律》,载《经济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70~82 页。

② 李稻葵根据 122 个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 1960~2005 年间的平均劳动份额和人均 GDP 横截面数据,发现劳动报酬的对数和人均 GDP 的数据呈“U”字形关系,即: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劳动份额相对较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份额将下降,然后到拐点,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劳动份额将逐渐上升。但该结论与一个基本的事实相悖: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劳动份额具有长期的稳定性,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等,劳动份额则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而上升,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过程。从数学上讲,横截面数据的变动规律不能直接推广到时间序列中的变动规律。因此,仅由横截面的相关关系恐怕无法得到中国劳动份额也符合“U”字形规律的结论。参见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 中劳动份额演变的 U 型规律》,载《经济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70~82 页。

规律，并与发达国家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劳动份额进行比较，故不进一步探讨 20 世纪后期影响劳动份额波动的因素的具体实证研究结果。

显然，中国劳动份额变动的结论与国外劳动份额波动的事实存在一定差异。从国际上看，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经过马丁（R. F. Martin，1936）、金（W. I. King，1930）、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51）和约翰逊（D. Gale Johnson，1954）等人的努力，经济学家得以观察发达国家劳动份额的长期波动情况，他们发现英、美等国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劳动份额保持着长期的相对稳定性。

表 1 说明 1860 ~ 1940 年间英国劳动份额（工人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围绕在 40.3% 上下随机波动，标准差为 0.0019，美国围绕在 75.1% 上下波动，标准差为 0.0021，变动幅度都较小。如果将劳动份额和其他经济数据变动结合起来观察，劳动份额的稳定性令人吃惊。表 2 列出了美国 1870 ~ 1950 年的劳动份额和人均 GDP、城市化水平、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以 1870 年为基期，到 1950 年，即便美国人口增长了近 3 倍，人均 GDP 仍然增长了 3 倍多，城市化水平提高了 1.5 倍，农业产业的比重下降了 82%，但劳动份额仍然围绕着平均线波动，变动幅度明显小于其他指标。

表 1单位：%
美国和英国 1860 ~ 1940 年的劳动份额

国家	1860 年	1870 年	1880 年	1890 年	1900 年	1910 年	1920 年	1930 年	1940 年
美国	78.1	78.7	76.5	75.5	77.7	76.0	73.9	76.7	77.6
英国 ¹	43.5	38.6	39.8	41.5	40.7	37.8	43.0	41.0	38.2
英国 ²	57.8	53.8		58.7	58.4	56.0	66.6 ³		

注：1. 指普通工人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2. 指国民的劳动者报酬（既包括普通工人的工资和薪水，也包括自雇者、企业家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3. 为 1924 年数据。

资料来源：英国 1860 年数据来自 R. Matthews 等，British Economic Growth，1856 - 1973，pp. 164 - 165，1870 ~ 1940 年数据来自 E. H. Phelps Brown and P. E. Hart，the Share of Wage in National Income，the Economic journal，1952，Vol. lxii，pp. 253 - 277。美国数据来自 Joseph D. Phillips，Labor's Share and "Wage parity"，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pp. 164 - 174，和 Irving B. Kravis，Relative Income Shares in Fact and Theor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p. 917 - 949。

表 2单位：%
美国 1870 ~ 1950 年一些经济和社会指数

项目	1870 年	1880 年	1890 年	1900 年	1910 年	1920 年	1930 年	1940 年	1950 年
农业变化	100	85	77	99	93	72	53	33	18
劳动份额	100	97	96	99	97	94	97	99	89
城市化水平	100	110	137	155	178	200	219	220	249
人均 GDP	100	147	182	222	273	283	327	310	412

资料来源：人均 GDP、农业产业变化来自吉尔伯特·菲特，吉姆·里斯著：《美国经济史》，司徒淳、方秉铸译，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73 ~ 385 页；城市化水平的数据来自 M. 波斯坦、D. 科尔曼，彼得·马赛厄斯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工业革命及其后的经济发展：收入、人口及技术变迁》，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58 页；劳动份额数据同上。

在其他经济变量都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为何劳动份额能够保持长期稳定性？理论上，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要素收入取决于其边际生产率，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仅取决于要素间的边际替代率，若要素的边际替代率保持不变（或者接近于 1），劳动份额将保持稳定；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要素分配还将取决于技术进步的类型，资本节约型（劳动扩张型）的技术进步将有利于劳动，保持劳动份额不至于下降，而劳动节约型（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将导致劳动份额的下降。1850~1950 年间，由于美国和英国劳动与资本要素的边际替代率接近于 1，劳动份额对时间的变化接近于零，加上技术进步也倾向于劳动扩张性的技术进步，劳动份额便能保持相对稳定。

在实证研究中，早期研究更多从行业间的变动（internal shift）来解释长期稳定性问题，即劳动份额的相对稳定性来源于产业间转变效应的相互抵消。^① 劳动份额由三个变量决定：工人的数量、平均工资和国民总收入，如果将国民总收入看作一个外生变量，劳动份额便取决于普通工人的数量和实际工资。一方面，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作坊，又吸引了大量农民进入工业部门，工业化导致工人的增长速度比自雇者、家庭工作者和小企业主快，雇佣工人的比例可能增加，但另一方面，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管理的需要产生了大量的技术工人和管理者，这又会降低雇佣工人的数量，工人数量的变化取决于这两种相反的效应。由于技术工人和管理者的收入不被计入劳动报酬，^② 普通工人向技术工人和管理者数量的转变会降低国民收入中工资的比例，但它可能同时导致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的上升，并使得进入到其他部门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下降（因为新进入者往往只能获得较低的报酬），从而挣工资报酬劳动者的变动小于整个就业人口平均收入的变动。例如，1881 年，英国挣工资者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为 81%，1911 年为 74%，1931 年下降到 72%，但其真实工资则增加了 1 倍多，技能工人与普通工人的工资比也从 1880 年的 7.5 倍下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 4.5 倍，挣工资者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得以保持稳定。

19 世纪末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为垄断资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结合起来，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垄断集团，自由竞争市场的工资决定理论逐渐演变为垄断加成价格理论（mark-up）。卡莱克（Calecki, 1938）创立了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的收入决定理论，他认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垄断决

① 布朗和哈特较早从产业间变化来解释劳动份额的稳定性，参见：E. H. Phelps Brown and P. E. Hart, the Share of Wage in National Income, the Economic Journal, 1952, Vol. lxii, pp. 253 - 277.

② 需要注意的是，在早期的研究中，劳动收入仅包括手工劳动（manual labor）的工资，统计对象也只针对挣工资者（wage-earner），其他劳动者，如自雇者，技术工人以及管理者不在统计范围之内，早期对英国劳动份额稳定性的研究主要指手工劳动者的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凯恩斯对劳动份额稳定性的论断也是基于对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参见：E. H. Phelps Brown and P. E. Hart, the Share of Wage in National Income, the Economic Journal, 1952, Vol. lxii, pp. 253 - 277 和 Keynes, John M. "Relative Movements of Real Wages and Output." Economic Journal, 1939, March: 34 - 51.

定了劳动份额。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总流通中资本利息和薪水（企业家、管理者的收入）的相对比例近似等于平均的垄断水平，即加成价格（markup pricing）。由于劳动份额等于1（国民收入）减去总资本和总薪水的比例，它与厂商在产品市场上的垄断程度呈反向关系，垄断程度越高，劳动份额可能越低，反之亦然。以1880~1935年英国的劳动份额的变动情况来看，1880~1913年，由于厂商的垄断能力增强，资本的回报上升，导致劳动份额下降9%；1913~1935年，虽然厂商的垄断力量有所加强，但由于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下降，垄断对劳动份额的副作用被抵消，劳动份额得以保持稳定。^①但一些早期的实证研究表明厂商的垄断对劳动份额没有显著影响。莫洛聂和艾伦（John Moroney, Bruce Allen, 1969）研究了美国27个行业的劳动份额情况，采用各行业中四个最大公司的集中度（four-firm concentration ratio）测量厂商的垄断程度，发现劳动份额与垄断之间没有系统联系——在所有27个行业中，只有5个在统计上负相关，而还有一个正相关，说明垄断力量难以解释劳动份额的变化，用工资率表示的要素比率有较强的说服力。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于1848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工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导致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垄断，工资得到增长。厂商因为担心价格上涨会削弱其竞争力，可能不会将工资增长的全部份额都转移到加成价格，而宁愿接受一个较低的利润水平。因而，工会可以影响企业的垄断程度，导致利润向工资的分配（特别是在加成价格很高，厂商有能力支付较高工资时），劳动份额得以提高。但如果工资谈判是整个产业的集体谈判，或者工资增长非常迅速，以至于蔓延到整个产业时，单个公司对竞争力削弱的担心会下降，增长的工资可能全被转移到加成价格，工会对劳动份额的影响相应下降。这样，问题的关键在于劳动需求曲线的弹性：如果劳动需求曲线不变，因为增长的工资中只有部分被转移到价格里面，工资的增长毫无疑问会导致劳动份额的上升；但如果经济中出现了普遍的工资增长，劳动的需求曲线向上移动，工资增长不一定带来劳动份额的提高。森勒尔（N. J. Simler, 1968）用各行业集体谈判合约所覆盖工人的比例作为工会化程度的指标，研究了工会组织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他发现工会力量与劳动份额并不存在显著的正关系，工会虽然会导致名义工资的增加，但并不必然导致劳动份额的增加。由于真实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当且仅当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比平均生产率增长得更快时，劳动份额才会增加，而且，雇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资本替代劳动和选择劳动节约型的生产函数或者单位产出值来对抗工会组织和工资的增长，降低工会对劳动份额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劳动收入比都相对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60年代末，美国的劳动份额发生了变化，农业部门的劳动份额

^① 参见：M. Kalecki, The Determinants of Distribution of the National Income, *Econometrica*, 1938, Vol. 6, No. 2, pp. 97-112.

逐渐下降,制造业部门的劳动份额则相对上升,整个经济中的劳动份额有所上升。马丁和哈夫利切克(Marshall Martin, Joseph Havlicek, 1977)认为美国1952~1969年间,农业部门的劳动份额从38.6下降到22.3,西奥多·莱洛斯(Theodore Li-anos, 1971)认为1949~1968年间,相应的比例从42.9下降到20%。对于这个期间总劳动份额的变动,直接的原因可能是:政府部门雇员大量增加,导致总劳动份额的增长;农业部门的劳动收入比较低,且常常容易被低估,农业部门重要性下降使得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劳动份额较高的其他部门,导致整个经济中的劳动份额上升;另外,战后资本折旧的政府补助大幅增长,导致固定资产折旧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再从技术进步的类型与资本与劳动的边际替代率等角度来说,劳动份额的变动说明,或者是要素的边际替代率发生了变动,或者是技术进步的类型出现转变,或者二者同时出现变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资本扩张型(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降低了劳动者的需求,还使得资本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虽然制造业和农业都出现了资本深化(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但由于美国制造业中,要素的替代弹性小于1,^①资本和劳动呈现互补的关系,导致制造业劳动份额上升,而农业的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②导致农业的劳动份额下降。

那么,中国劳动份额的波动为何出现了与发达国家相似阶段不同的特征?是因为中国劳动份额确实下降了,还是由于国内劳动份额的数据和测度方式存在问题?现有文献的数据主要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1952~2004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历史资料》,后者直接包括收入法计算的1993~2004年各地区、产业的国民收入分配数据,一些研究者据此计算,认为中国的劳动份额出现下降。需要注意的是,劳动收入是劳动者通过劳动所获得的报酬,通过土地、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获得的收入不应计入劳动收入。本文认为,劳动份额的稳定性是一个长期趋势问题,难以利用短时间(三年、五年,或者十多年)数据来探讨长时期劳动份额变化的规律;而且,直接用《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劳动者报酬及相关数据来计算劳动份额,不仅有悖于劳动者报酬的内涵,也不符合国际上计算劳动份额的惯例。因此,本文首先对劳动者报酬进行了调整,并对劳动份额的波动进行了分解;接着,本文比较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劳动份额变动的情况,发现中国劳动份额似乎陷入了低水平均衡的陷阱;最后,本文对此进行了尝试性的解释。

① G. E. Ferguson John Moroney 等人发现,60%的劳动份额的变化可以通过资本深化得以解释。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同制造业上升的观点,如 Damodar Gujarati 就认为美国制造业的劳动收入比从1949年的55.3下降到1964年的47.4;Graham Richards 则认为,澳大利亚1945~1968年的制造业的劳动份额从59.7下降到了50.65,虽然同期的总劳动份额从1950年的51上升到1968年的58.3。

② Marshall Martin 和 Joseph Havlicek 认为1946~1964年,美国农业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率为1.5,远大于1。参见:Marshall A. Martin and Joseph Havlicek, Souther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77, December, 137~141。

三、数据及方法

(一) 劳动份额的数据来源

国内主要有五种劳动份额数据来源：(1) 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从1996年开始，《中国统计年鉴》以收入法计算的国民收入项目结构列出了该年各地区GDP中劳动者报酬的数据，将各地区劳动者报酬加总，便可以粗略得到全国劳动者总报酬数据；(2) 1952~1995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该资料以分地区的形式列出了1978~1995年不同产业（三大产业）和行业（14个行业）的劳动者报酬；(3) 1996~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列出了各地区1996~2002年的不同产业和行业的劳动者报酬；(4) 《1952~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该资料包括1993~2004年各地区三大产业和7个行业的劳动者报酬数据；(5) 一些地区统计年鉴，一些省级单位的统计年鉴列有该地区劳动者报酬的数据，但各地区相关的劳动者报酬数据缺乏一致性，使用起来具有一定难度。利用上述数据，采用国内以往研究常用的计算方式（本文称之为未调整的方法和数据，即将各地区劳动者报酬按照地区和产业进行加总，便得到全国总劳动报酬和各产业的劳动者报酬，然后除以相应的GDP），本文得到了1978~2007年间全国总劳动份额和各产业劳动份额数据，见表3。

表3 未调整的1978~2007年全国及三大产业劳动份额 单位：%

年份	总劳动份额	一产劳动份额	二产劳动份额	三产劳动份额
1978	49.6	86.7	31.0	43.3
1979	51.4	86.5	31.4	45.8
1980	51.2	87.1	31.8	45.7
1981	52.7	88.4	31.7	45.7
1982	53.6	81.0	32.6	55.2
1983	53.5	87.1	30.9	44.9
1984	53.7	87.5	32.6	45.8
1985	52.7	87.8	34.5	42.7
1986	52.8	82.1	35.1	49.3
1987	52.0	85.6	35.5	43.3
1988	51.7	85.0	36.1	43.1
1989	51.6	84.3	37.2	38.1
1990	53.3	85.6	38.9	43.3

续表

年份	总劳动份额	一产劳动份额	二产劳动份额	三产劳动份额
1991	52.1	79.6	39.0	47.7
1992	50.0	84.7	37.3	43.3
1993	49.5	85.7	39.4	42.1
1994	50.3	85.1	39.6	44.1
1995	51.4	86.1	41.5	43.8
1996	51.2	86.5	41.4	43.4
1997	51.0	86.4	42.0	43.7
1998	50.8	86.6	42.4	43.7
1999	50.0	86.5	41.9	43.7
2000	48.7	85.6	40.6	43.9
2001	48.2	85.4	40.3	43.9
2002	47.8	84.5	39.9	44.3
2003	46.2	83.4	38.8	43.4
2004	41.6	90.6	33.3	36.2
2005	41.4			
2006	40.6			
2007	39.7			

注：2004 年以来，劳动者报酬的统计口径发生细微变化，笔者按照同一统计口径计算了 2004～2007 年中国总的劳动报酬份额，分别为 43.15%、43.25%、42.59% 和 41.77%，劳动份额仍然出现明显下降。

资料来源：1978～1995 年数据来自《1952～1995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 年数据来自《1996～2002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2003～2004 年数据来自《1952～2004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2005～2007 年数据来自 2006～2008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表 3 中，全国总劳动份额先升后降：1978～1984 年间，劳动报酬份额轻微上升，之后缓慢下降，自 1995 年起下降更明显，到 2007 年，劳动份额下降到 39.7%，比 1990 年（53.3%）下降了 13.4 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高达 26%，我国以往研究的结论由此而来。从各产业劳动份额的变动来看，第一和第三产业的劳动份额有一定波动，但总体上比较稳定；第二产业的劳动份额在 1978～1998 年间持续上升，1999～2003 年则逐渐下降。表 3 暗含了全国总劳动份额下降的直观解释：由于第一产业的劳动份额远高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平均超过 1 倍），在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随着第一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其劳动收入在全国总劳动收入中的比重逐渐下降，进而导致全国总劳动份额的下降。

实际上，表 4 利用 1978～2007 年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数据说明了这个问题。1978 年以来，第二产业的比重变动不大，与 1978 年相比，除了 1982～1992 年变动较大，其他年份都较小；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则交替变换。1978 年，第一产业的比重为 28%，第三产业为 24%，到 2006 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为 12%，而第

三产业则上升为 39%，特别是 1993 年以来，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上升约等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由于第一产业的劳动份额远高于第三产业，产业结构的变动导致全国劳动份额的下降。

表 4 中国 1978 ~ 2007 年产业结构的变迁

年份	第一产业 (%)	第一产业 比重变动	第二产业 (%)	第二产业 比重变动	第三产业 (%)	第三产业 比重变动
1978	28.19	—	47.88	—	23.94	—
1979	31.27	3.08	47.10	-0.78	21.63	-2.31
1980	30.17	1.98	48.22	0.34	21.60	-2.34
1981	31.88	3.69	46.11	-1.77	22.01	-1.93
1982	33.39	5.20	44.77	-3.11	21.85	-2.09
1983	33.18	4.99	44.38	-3.50	22.44	-1.50
1984	32.13	3.94	43.09	-4.79	24.78	0.84
1985	28.44	0.25	42.89	-4.99	28.67	4.73
1986	27.15	-1.04	43.72	-4.16	29.14	5.20
1987	26.81	-1.38	43.55	-4.33	29.64	5.70
1988	25.70	-2.49	43.79	-4.09	30.51	6.57
1989	25.11	-3.08	42.83	-5.05	32.06	8.12
1990	27.12	-1.07	41.34	-6.54	31.55	7.61
1991	24.53	-3.66	41.79	-6.09	33.69	9.75
1992	21.79	-6.40	43.44	-4.44	34.76	10.82
1993	19.71	-8.48	46.57	-1.31	33.72	9.78
1994	19.76	-8.43	46.57	-1.31	33.57	9.63
1995	19.86	-8.33	47.18	-0.70	32.86	8.92
1996	19.69	-8.50	47.54	-0.34	32.77	8.83
1997	18.29	-9.90	47.54	-0.34	34.17	10.23
1998	17.56	-10.63	46.21	-1.67	36.23	12.29
1999	16.47	-11.72	45.76	-2.12	37.67	13.73
2000	15.06	-13.13	45.92	-1.96	39.02	15.08
2001	14.39	-13.80	45.05	-2.83	40.46	16.52
2002	13.74	-14.45	44.79	-3.09	41.47	17.53
2003	12.80	-15.39	45.97	-1.91	41.23	17.29
2004	13.39	-14.80	46.23	-1.65	40.38	16.44
2005	12.55	-15.64	47.51	-0.37	40.04	16.10
2006	11.73	-16.46	48.92	1.04	39.36	15.42
2007	11.30	-16.89	48.60	0.72	40.10	16.16

注：某产业、某年产值比重的变动幅度为绝对变动值，通过该产业该年产值比重减去基期（1978）年的比重获得。

资料来源：《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

但正如本文所指出的,这种未经调整的劳动者报酬数据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劳动份额的变动情况,它严重高估了农业部门的劳动份额,进而高估了全国的劳动份额,特别对早期劳动份额的高估程度更严重。

(二) 数据调整的原因及方法

基于两个主要原因,需要调整我国劳动报酬的数据,否则将会错判中国劳动份额变动的规律。

1. 劳动份额的内涵。劳动份额是劳动者报酬占经济产出的比重。从内涵上讲,劳动报酬是劳动者付出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账户中,劳动者报酬由雇员报酬体现出来。按照《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统计资料》的解释,雇员报酬作为对雇员核算期内所做工作的回报,是企业付给雇员的现金或实物报酬总额(但不包括任何由雇主支付的,按工资和薪金征收的税,如工薪税)。在具体计算劳动报酬时,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些劳动者不是雇员,而是自雇者。自雇者被定义为在其中工作的非法人企业的唯一所有者或共同所有者,包括所有完全为自给最终消费或自给资本形成而单独或共同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自雇者得到的经营收入是混合收入,只有部分属于劳动报酬,其余的属于资本性收入或土地收益。在计算劳动报酬份额时,应该从自雇者的经营收入中剔除其资本性收入和土地收益。

2. 国际研究趋势。一直以来,欧美学者在劳动份额的测度方面存在诸多争论,关键问题是究竟如何计算企业家和自雇者的劳动收入。在早期一些研究中(凯恩斯,1939;布朗和哈特,1959),劳动报酬计量范畴较窄,仅指普通工人的工资(wage),不包括自雇者的收入,也不包括技术工人和管理者的薪水。随着企业家数量的逐渐增加和人们劳动报酬观念的变化,企业家和自雇者劳动收入的计量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关注。通常的计算方式是将企业家和自雇者的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给劳动和资本。约翰逊(1954)将企业家收入的2/3划归劳动报酬,1/3划归资本性收入,这种做法被广泛接受。^①

工业化国家拥有较完备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其劳动份额的数据较准确。我们能获得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报酬数据主要来自联合国统计资料,仅包括雇员的劳动

^① Karis 较早接受他的计算方法,认为企业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为65%,资本性收入份额为35%,参见:IB Kravis, relative income shares in fact and theor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9, Vol. 49:917-949。而一些研究也证明该估计符合工业化国家的事实。麦迪森发现主要工业国家的资本收入份额普遍集中于0.3附近,而Englander和Gurney通过调整了自雇者的收入之后,发现OECD国家资本收入份额普遍在0.3~0.35之间变动。Young估计韩国的资本份额为0.32,中国台湾为0.29,新加坡为0.53,中国香港为0.37。参见:Maddison, Angus. "Growth and Slowdown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Techniques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87, June, 649-698; Englander and Gurney. "OECD Productivity Growth: Medium-Term Trends," OECD Economic Studies 1994, No. 22 pp. 111-130; Young, Alwyn. "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1994. NBER Working Paper No. 4680.